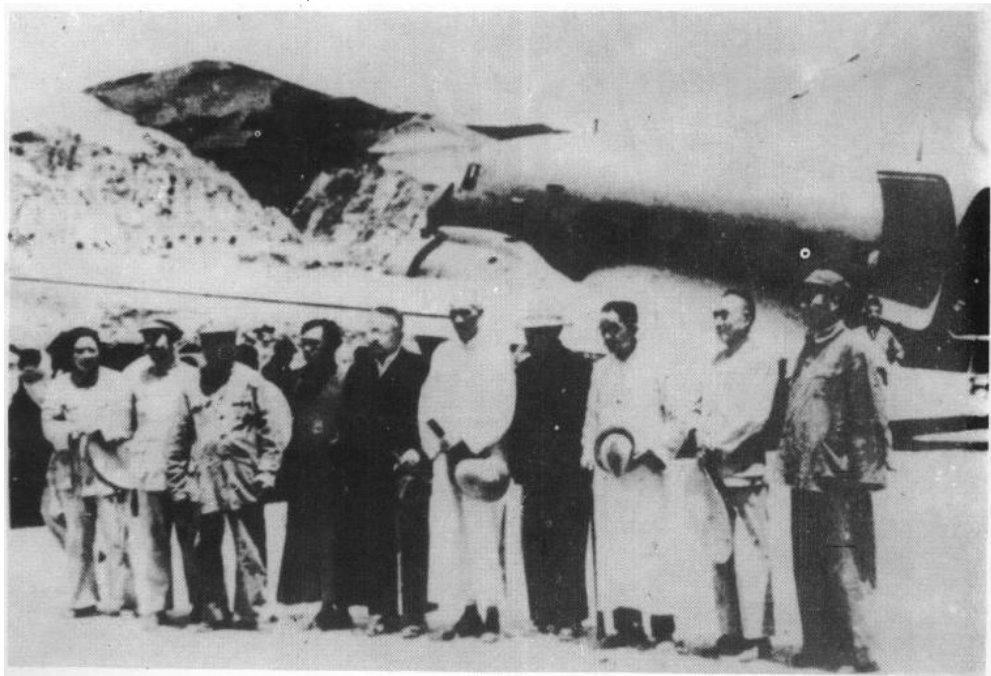


傅 斯 年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聊城地区政协工委 合编
山东省政协文史委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傅斯年等飞赴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抵达延安机场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图为在机场的合影。

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孙永鑫提供）

適之先生：

作別兩個星期，想先生長途奔
喪，定然悲傷辛苦的很。十年作
客回來，便了，母憂，本是人生最不
幸的事；但是事情既已如此，只
得以理性制服感情，節哀節

傅斯年先生手迹（部分）

馬氏原出隨出附呈。

駱先吾兄院長大鑒。前經轉示馬主席鴻達
書，茲已奉悉。其所介紹之張業鐸君，如欲入
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於研究工作，例應先將其
著作送所審查，經審查合格後，方可提出所務
會議加以決定也。茲即函知馬主席，轉告張君
請其即將著作寄來，以便審查。是所企禱。此
致頌。

大馬

傅斯年

六月十七

目 录

程思远先生的信·····	(1)
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邓广铭 (2)
回忆傅孟真先生·····	杨向奎 (9)
六同求学前后	
——回忆导师傅孟真先生·····	王利器 (12)
文学古训辨证·····	王利器 (18)
回忆傅斯年先生·····	杨志玖 (34)
我所知道的傅斯年·····	傅振伦 (39)
怀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	朱仲辉 (42)
傅斯年的少年时代·····	岳玉玺 (52)
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	赵润生 (58)
傅斯年与“新潮社”·····	王永贞 (72)
英德留学生活片断·····	李 泉 (81)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	李 泉 (87)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王 云 (92)
创建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	李 泉 (102)
傅斯年的史学观点与治史方法·····	李文平 (111)
傅斯年与朗克学派·····	侯云灏 (125)
傅斯年与“大内档案”之收藏整理·····	李 泉 (134)
领导组织殷墟发掘·····	王 云 (14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张礼恒 (150)

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	岳玉玺 (155)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与昆明“一二·一”运动·····	马亮宽 (169)
傅斯年的国际时事评述·····	陈德正 (177)
“倒宋运动”的主将·····	程爱勤 李慧玲 (187)
彷徨徘徊恋故土	
——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马亮宽 (193)
浮海说三千弟子·····	李 泉 (198)
傅斯年家庭生活琐谈·····	江心力 (207)
傅斯年轶事四则·····	周大全 (212)
傅斯年与中国学校教育·····	傅炳旭 (214)
质朴的诗句 人间的真情	
——漫谈傅斯年的诗·····	宋月华 (221)
傅斯年逝世的前前后后·····	李 泉 (224)
从师陈李 途殊情难断·····	张桂华 (230)
傅斯年与胡适·····	江心力 (236)
“坝麓相应”	
——傅斯年与顾颉刚·····	徐明文 (245)
傅斯年与陈寅恪·····	马亮宽 (252)
政学殊途的君子之交	
——傅斯年与朱家骅·····	徐树英 (263)
台港知名人士忆傅斯年·····	李 泉 徐明文 辑 (272)
傅斯年生平简谱·····	马亮宽 江心力 (343)
后记·····	(359)

程思远先生的信

编者按：下文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致傅斯年先生的族侄、聊城市政协委员傅乐铜同志的信，是对向他征集有关傅斯年文章的答复。信中对傅斯年先生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对傅在中国现代史上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附梓于此，以飨读者。

乐铜同志：

大函和通知均已收到。得知你们准备在九月下旬召开全国性的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健将，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当我当第四届国民参政员时，我曾听到他在参政会上抨击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铿锵有声，正气凛然。1948年国民党立法院在五月召开的院会中，除CC立委外，一致推举傅先生为立法院长，以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陈立夫相对抗。此时因傅先生在美国讲学，来函表示不参加院长竞选。从此一事可以了解，他在社会上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对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解不深，不能写为一篇文章。而对于九月间在聊城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亦不克应邀前来参加。请向主办各单位代致拳拳之意。端此布达，顺颂敬祺

程思远

1991年7月5日

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邓广铭

我是山东临邑县人。民国初年，临邑县和傅斯年先生的家乡聊城县同属山东省东临道。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就听有人说，聊城有个傅斯年，是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先生旧学功底深厚，在北京大学是拔尖的学生，而且和罗家伦等人主编过《新潮》刊物，所以在我们那偏僻的山村里都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很崇拜他。可是听了他在北大讲的第一堂课，我却有些失望了。

我到北京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正赶上胡适先生做文学院长，他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来教《中国通史》课。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在北海静心斋，离北大不远。史语所里出名的学者很多，于是就请李济先生讲了考古部分。商周史也请史语所的人来讲。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第一堂课就请来了傅先生，想让他讲个商周史的开场白，但陈先生没把话说明白，傅先生以为是来和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们随便座谈，所以没做任何准备，来到一看，北大二院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他说，“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听课”。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

我和傅先生同宗的侄子傅乐焕是同班同学。乐焕当时就住在傅先生家里，生活和学业都得到傅先生不少帮助（他解放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作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我下课对乐焕说：“傅先生大名鼎鼎，可是文章写得不多，课讲得也不怎么样，正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乐焕也不反驳我。

后来我又去听傅先生别的课，才知道他的学问之大，一般人是赶不上的，他是通人。我们有些人佩服他的学问，经常听他的课。他给我们讲过《历史研究法》，原打算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了前边几章就搁笔了，原因是行政事务太多。他没做过官，但很关心政治，看看他写给胡适的信就知道了（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外面事务太多，没时间写文章，没时间准备课程，所以讲起课来往往没条理。

傅先生国学的功底很好，但全力提倡新文化，因此为了是否读经问题和孟森先生有过辩论。记得我们同班的几个人，我，傅乐焕，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曾经给天津《益世报》编过《读书周刊》。孟先生见了说：你们这个《周刊》编得很好，这表明你们的学问都不错，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数你们这个班水平最高。可惜你们写得都是白话文。白话文是“慈善事业”，是写给不懂文言文的人看的，写给学者看为什么用白话？文言变成白话，加上标点符号，那韵味就变了！后来傅先生写文章，反对学生读经，孟先生主张读经，他们有过争论。

傅先生所以在北大兼课，主要是想为史语所选拔人才。当时史语所人才济济，像陈寅恪、徐中舒、董作宾、郭宝钧、李济等等，但总要培养些青年学者做接班人。所以，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傅先生也曾提出让我去，但我因为和胡适先生早已约好，让我毕业后留在北大工作，而且我的家眷在北平，妻子在这里教小学。史语所当时已迁南京，我不愿离开北平南下。尽管傅先生说到南京帮助我内人找工作不会有困难，但我还是没有去。

我的毕业论文是胡适先生指导的，题目是《陈亮传》。陈亮和辛弃疾（辛稼轩）是好朋友，我查了所有研究辛稼轩的文

章,包括梁任公的著作。这些文章都没有反映他们交往的情况,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关系。我的论文胡先生给打了95分,评语里说陈亮和辛稼轩的交往方面材料不充实。我毕业以后在北大作助教,业余时间就搞辛稼轩,而且向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研究费用。胡先生说,梁任公兄弟都研究过辛稼轩,这个题目不好搞,你得先写出文章,说明你掌握的材料比梁任公多,有超过他的地方,基金会才有可能批准你的申请。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胡先生、傅先生都说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和陈寅恪先生结成了师弟子的关系。陈先生当时在清华任教,并不认识我,他曾在北大兼课,但我在北大读书时他正好没到这里上课。陈先生看了我的那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于是到处打听此文的作者。后来问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向他作了介绍。事后傅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时,我就断定,我的申请一定能被批准,因为胡、傅两位先生都很尊重陈先生,很推崇他的学问,他们都是基金会的会员,而胡先生又主持此事。后来我的申请果然被批准了。我写成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简注》两本书,解放后都出版了。傅先生移居南京后,还给我写过不少信,对于写这两本书给予指导。我还记得他在一封信中反对写注,说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精力,不值得。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讲师、助教不去。我留在北京,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去看书。那时,北大已被日本人接管,我不愿再到北大图书馆去,而北京图书馆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修建的,日本没有对美国开战,所以没有接管北京图书馆。到了1939年,我接到了傅先生的一封信,通知我到昆明去。我到了昆明,傅先生安排我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去作高级助教。原来在北大未南

迁前，是胡先生任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到了昆明，由傅先生做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陈寅恪先生也在那里任研究生导师。1940年冬，昆明常有敌机轰炸，傅先生决定把史语所迁往四川，说要迁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免得敌机再来骚扰，最终选定了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一定要我跟着去。此后我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研究，在李庄住了两年。不过，我的编制还是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薪金是由中英庚款支付的。当然，我也很愿意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

我是单身一人到昆明、四川去的，家眷仍留在北平。当时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先生考虑到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我去复旦大学。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大意是说：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先生说这话的意思是，到复旦去，起码要聘我做副教授。我到了复旦大学，校方真的聘我做了副教授，我教书教得还不坏，第二年，他们就请我做了教授。当时复旦大学在北碚，我经常到重庆看望傅先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教育部宣布胡适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胡先生在美未归，暂由傅先生代理。傅先生一再发表声明：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员后的北京大学一概不聘用。这样一来，伪北大就有不少人写信给傅先生，为自己辩解。周作人、容庚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除为自己辩解外，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傅先生。当时我正好在傅先生那里，他便让我代写一封公开信回敬，我说：“这件事我可做不了！”这件事后来如何收场

的，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我每次去看望傅先生，他都要交给我许多事做，主要任务是让我代他写信，所以我替他写过不少信。

1946年5月4日，傅先生由重庆乘飞机去北平。没走以前，他便聘定我到北大教书，并说：“你到北大教书，必须降级使用，只能当副教授，不能当教授。你们那一届的同学，外文系毕业的现在还当教师，理科的大多数没当上副教授，你去当教授不合适。”我说：“当什么都可以，我不在乎。”于是傅先生便给我预购了飞机票。5月7日，我到了北京，8日便去学校看他，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

“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从此我就当了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我虽然到了北大，但五六两个月的薪金还是由复旦发给的，傅先生说：“既然复旦给了你薪金，那么这两个月北大就只管你饭吃，不能再给薪水。”不管对准，他都是秉公办事的。这年的7月，胡先生来到了北平，10月，傅先生离开了北平去了南京。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傅先生就对我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不做。”其实当时傅先生只聘我任教职，并没有让我承担行政上的职务，胡先生来了，我不能推辞，只好继续干。这是我和傅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他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

不走。”我没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

后来胡夫人江冬秀的一个堂弟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适之先生夫妇，见到了傅先生。傅先生对他说：“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1950年底，傅先生去世了。次年春，我们得知这个消息，都有说不出的悲痛。陈寅恪先生当即写了一首诗《读傅青主〈霜红龕集〉有感》，寄给我和乐焕等几个人看。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这是陈先生借咏傅山其人来悼念傅先生的。

傅先生是通才。他和陈寅恪先生一样，出国读书不是为了拿学位，他去过欧洲好几个国家，进过几个大学，读了七八年，没有一个学位。他不是出国留学，而是“游学”，哪里有著名学者，就到哪里去听课。傅先生之所以到英国去听实验心理学、人类学，是因为伦敦大学以这两门学科而闻名于世界，傅先生写给适之先生的信里提到过这个问题。

傅先生聪明，有才华，有能力，可以说是绝顶聪明而又才华横溢。傅先生原来是胡先生的学生，后来成了好朋友，胡先生的事傅先生都能替他作主。抗战期间我在复旦大学时，就常常听人讲，傅先生说“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记得傅先生代理北大校长时曾对我说：胡先生是“性善”主义者，有时不能听他的，如果事事都按他说的办，非把学校办糟不可！胡先生也承认，傅先生旧学根底比他好，才气比他高，办事能力比他强。记得从前还流传过这

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俞大维这个人很聪明，本来也搞文史，也颇有成就，自和傅先生结交后，便忽然弃文学理，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有人说胡先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傅先生也是如此。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产生一些误会。有人曾说：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上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傅先生做事，做学问，气魄大得很，眼光也远得很。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还有一些都是河南人，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傅先生贡献也很大，史语所聘请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不仅在国内是著名学者，而且在国际上名气也很大，能把他们聘了来，也是不容易的。傅先生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多说。不过，有些人总以为傅先生本身的著作还不够多，除《性命古训辨证》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但是，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回忆傅孟真先生

杨向奎

本世纪30年代，傅孟真先生先后在北大文学院开有三门课程：中国文学史（1932年）；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1933年）；秦汉史（1934年）。中国文学史是当时中文历史两系选修课程，选课的学生很多，我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也选了这门课。傅先生讲书，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他写有讲义，但那是参考读物，从“诗经”讲起，讲到雅颂的起源，“颂”是采用阮元的说法，而“雅”是参考了章太炎说，以为“雅”

“夏”同源。傅先生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初学者不容易接受，所以当学期考试时，许多选课的人成绩不好，傅先生在第二学期开始，宣布上学期考试成绩时，说：“有些人的成绩不好，全班最好的两人，是徐芳、杨向奎。”徐芳是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聪明绝顶，而长于新诗。不久，她和北大的卞之琳、何其芳等同学并为有名诗人。因为傅先生这一宣布，等于给我和徐芳作了介绍，以后我们成了好友，毕业后一直在通信。40年代末，她去台湾，成了贵妇人，再也不见她的清新诗句了。

第二年我选了傅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这是历史系的课。当时北大的历史系简直是中国古代史专业，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有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史”，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当时所谓古代史是指先秦史。这些先生讲课各有特点，

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傅先生总是坐在讲桌后面，议论不休。他们都是大师，在大师们的教导下，出来许多很有名气的学生，比如山东的邓广铭、傅乐焕、张政烺。他们都是傅先生的及门弟子，著名的史学家。

傅先生博学，他不仅是史学家，在思想史上他也是有地位的学者。他喜欢读法国物理学家马赫与法国数学家普思加费的书，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提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所主张的因果论。如果傅先生读了爱因斯坦的书，我想会改变他的哲学上的看法，而使他走向辩证的观点，会相信无论是自然与社会都在有规律地发展。

我最初知道傅先生的大名，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在这篇自序内，他说在北大读书时，他和傅先生同住在北大西斋一间屋子里，他们共同去听胡适先生的课而受教育的过程。后来胡先生也说，他初从美国回来在北大授中国哲学史，得到两位最有学问的同学傅斯年、顾颉刚的帮助，得以维持下来而走向坦途的经过。后来胡、傅、顾三人建立了一个学派，一个中国古代史及哲学史的学派，这个学派推翻了旧的传统史学观，建立了崭新体系的古史学派，他们大胆地怀疑，小心地假设，而引起一场波澜壮观的古史讨论。虽然在这个学派中，胡、傅、顾的理论也各不相同。

抗战时期，我在后方教书，经常和傅、顾两先生通信。当我初在兰州甘肃学院教书时，傅先生怕我的处境不佳，当杭立武自重庆去兰州时，他给杭立武信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在兰州寻找我，知道我在甘院教书，也就罢了。对于傅先生的关心，我至今未忘。我到甘院文史系教书，最初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去当讲师，不久，又因为傅先生这一封信，

暑假后即改为教授，当时不过廿多岁，是年轻的教授了。以后在三台东北大学教书时，我写了一本《西汉经学与政治》，是针对顾颉刚先生的著作而有不同意见的书。出版后寄给历史语言所傅先生及董作宾先生各一本，得到他们的好评，董先生给我有信，傅先生的评价是后来王振铎教授相告，他说孟真先生对你的评价很高。这一方面是对我的鼓励，一方面使我有知己之感。

抗战结束后，1946年夏我到北京，那时傅先生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也在北京，住东厂胡同现考古所内，当时傅先生一家住北房，张政烺兄住西厢，梁思永先生住东厢。我经常去找张苑峰（政烺），有时见到傅先生，几次我们随傅先生一家去北海茶座吃茶，一次他问我：“暑假后你到哪里教书？”我说：“不想去东北大学了。”先生说：“你到哪儿去，我介绍。”后来他和杨振声先生共同介绍我去青岛山东大学，这消息是邓恭三兄告知我的。

傅先生是一位爽直的学者，肯帮助人，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回想过去，我一直在他的帮助教育中。但在我的心中，对傅先生始终存在着隔阂，这隔阂的形成是我受了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的影响，后来又受了与傅斯年先生不同学派思想体系的影响，在学术思想上，价值观念上，与先生很难合拢。以致于在学术问题上，当我谈到傅先生时，只能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了。

1990年12月29日于北京